

# 京派文学的世界

许道明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 京派文学的世界

许道明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沪)新登字 202 号

责任编辑 杜荣根

责任校对 陆宏光

**京派文学的世界**

许道明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国权路 579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 字数 324,000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7-309-01366-2/I·105

定价:14.00 元

## 序

本课题是我对现代中国 30 年代文学思考的一个侧面,也是前几年对朱光潜、李健吾等京派作家思考的一个扩展。

京派,作为一个文学群体或派别,呈示着不自觉的形态。我的规定,不取晚清民初梨园的标准,也无意和目下流行说法认同,多有调和的意味。朱光潜的理论和沈从文的创作,是我网结这个群体的纲,并且注意有一个前后左右的范围,以及从文学与政治的保持距离、向本土和异域文化中伸出援手,倾向平正雅驯的风格等等共通方面,自然也多少顾及作家活动、交游的地区背景。因此,严格地论证哪位是京派作家,哪位不属这个范围,并不是我的任务。

本书稿前三章是八个相关联的一般论题,大体具有总论的性质;后五章基本以文体论列,权作分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等重要文献是我发表意见的主要指导思想,从我国现代文学历史的坐标中寻求京派作家及其事业的位置,阐述它的特征和性质,是我努力的目的。因而,相对而言,我突出了京派文学作为民主主义统一战线文学的意义,并且在可能的范围内,着重清理这一文学派别在文学品格上应该重视的方面,或正面,或反面,无论对于历史,抑或之于现实。

学术界业已作出的有关成绩,对我这份企图总结帐的工作提供了颇多启发;本书稿主要部分在复旦大学有关专业的两期助教进修班讲授过,得到同好诸多的帮助。但是,我所面临的困难还不少,作为草创,是需要估计到不成熟,也需要不断警策自己的。

多承复旦大学出版社接受并同意出版这部书稿,谨在此敬致

我的谢忱。  
是为序。

许道明

1993年12月25日

# 目 录

序	1
<b>第一章 作为文学流派的京派作家群</b>	1
一 京派文学及其流派特征	1
二 起伏消长 20 年	20
<b>第二章 冲突与调和</b>	36
一 京派作家的社会思想	36
二 京派作家的文艺思想	50
三 在中西文学的冲突中	65
四 在现代与传统之间	76
<b>第三章 京派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b>	90
一 京派作家论中国现代文学	90
二 京派文学的历史地位	108
<b>第四章 京派诗歌</b>	122
一 概论	122
二 冯至—废名	134
三 陈梦家—方玮德—林徽因	144
四 孙大雨—孙毓棠	157
五 林庚—曹葆华	165
六 汉园三诗人	173
七 方敬和九叶诗人	185
<b>第五章 京派散文</b>	196
一 概论	196

二	废名—梁遇春·····	206
三	沈从文—方令孺·····	214
四	冯至—李健吾—吴伯箫·····	224
五	何其芳—李广田·····	236
六	芦焚—萧乾—方敬·····	245
<b>第六章</b>	<b>京派小说</b> ·····	258
一	概论·····	258
二	废名—沈从文·····	270
三	凌叔华—林徽因·····	282
四	李健吾—芦焚·····	290
五	萧乾—汪曾祺·····	300
<b>第七章</b>	<b>京派戏剧</b> ·····	312
一	概论·····	312
二	丁西林—李健吾—杨绛·····	323
<b>第八章</b>	<b>京派批评</b> ·····	340
一	概论·····	340
二	朱光潜—沈从文·····	353
三	梁宗岱—萧乾·····	366
四	李健吾—李长之·····	377
五	李广田—袁可嘉—唐湜·····	391

# 第一章 作为文学流派的京派作家群

## 一 京派文学及其流派特征

现代中国的文学流派是借着“五四”郁勃的风雨发展起来的。大概军阀的穷兵黩武，以及这些军阀政治思想上的短视、文化层面上的怪诞，才使 20 年代上半期的中国文坛不因“五四”的落潮而衰颓下去，相反，各色名目的流派尽其所能都争着一显身手。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差不多用“雨后春笋”、“尼罗河大泛滥”之类的极言譬喻过。这绝无夸饰之嫌，倒是大体说得过去的。研究讨论现代文学的流派，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黄金时期。人们是有充分的理由也应有相当的热情去怀恋这个时期。消极地说，自此以后，流派的发展似乎再也没有那份富赡，那份辉煌；积极地说，因为有了先前的繁盛才有了可供后来伸延的因子。鲁迅在 30 年代确信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是当时唯一的文学运动，这种极端的概括无论从量从质，还是从实际影响而论，确乎是合理的标榜。不仅如此，后来文学的发展惊人地证实了他这一判断的正确性，似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这一判断甚至还笼罩着他身后的数十年。明白了鲁迅的这句话，也已经足以捉握现代中国 30 年代之后半个世纪文学流派发展的大半。

鲁迅的提示当然包含有某种愤激的情绪，它至少可以启发和引导我们必须聚精会神地关注和切实估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主流的地位和意义。但是它并不意味着可以扫荡其他，可以凭病态的尊严自乐。大致同自然界中的水系体貌一样，除无产阶级革命文



学作为一股涤荡呼啸的主潮之外，自然相对包含着巨量的支流，甚至是逆流。对后者的剖析和研究当是文学历史科学本身的内容，唯其如此，才会有主潮的真正意义上的认识。

或许人们过重地看取文学流派的自觉流派，陶醉于林林总总的团体、阵地的突起，相对轻视深入地探视流派之间在社会思想、美学观念、创作实践等等根本问题上实际存在的差异。倘若过于自信地用这类方式去描述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发展的历史，我们深表怀疑。因为，在我们看来，考察文学流派，既要研究它们的自觉特征，同时也必须注意捕捉它们的非自觉特征。我们打算讨论的京派作家群，不只是我国 30 年代有别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股重要支流，同时它们作为文学流派的存在，就带着自觉和不自觉的诸种特征。

京派作家群的出现，说来也奇怪，正值国都由北南迁，北京已易名“北平”。这批作家不因失“京”而南移，相反安于北方，写他们的梦幻，发他们的议论。他们虽大都有过身居京都的经验，有趣的倒是他们在失却京都的倚恃之后才成为京派文人的；而当北平回到人民手中，又为京都，北平重又易名为北京，时代苍茫，已使他们做不成京派作家了。

20 年代后期，随政治、文化中心的南移，一大批新文学初期的资深作家离开了北京，甚至还有不少如郭沫若等，改弦更张，参与了实际的政治运动。他们带走了“五四”史论般的气魄，带走了早期共产党人关于文学应是政治工具的信念，在中国南部，在上海这个近代商埠，和一大群志同道合者发育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算是演完了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历程。他们留在北方的东西也不少，其中就包括那份葱笼的自由主义，那份对发展个性的激情。于是，继续留在北平的那些作家既无法亲历并感受南方的那层恢宏的氛围，又依然迷恋着自由主义和个性主义，依然习惯于先前的方式，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生活上。严格地说，政治

文化中心的转移，多少使他们蒙领了程度不等的失落感，但是他们是一批特谄调和术的人物，他们借着相对平稳的文学空气，斯文有加地品味着“五四”果实的甘美，甚至有的还以“五四”精神的当然传人活跃在北方中国的这个古都之中。

就这样，北平的这些作家与上海滩的作家之间日渐多了一层隔膜，它见诸政治的见解，见诸文学的见解，甚至也见诸一般的行为方式。尽管老资格的叶圣陶、郑振铎、朱自清、新起的靳以、巴金做了许多实际的调和缓冲工作，终于还没有阻止沈从文捅出了他的那篇著名的讨伐海派的文学。就沈从文来说，他一生留下不少晶莹剔透的创作，但也写过不少不适宜甚至多少有些迂阔的文章。他本意在针砭某种不健全的文学现象，却冠之以“海”，自然牵动了上海的各色文人，敏感以至于对号入座，硬充一个角色，大抵又是不难理解的时尚。鲁迅《阿Q正传》问世以后的种种，即可说明。来而不往，非礼也。上海应战者不乏其人，连鲁迅也掷下了三篇沉重的篇章。各唱各的调，大抵是这场论争的格式，彼此寻求互补，确乎是天真的想法。本无所谓“京派”，北平的这批作家因批评了“海派”却替自己戴上了“京派”的桂冠。同时，京派的作家不因为诸如“海派”的各色先锋性而退却阵地，放弃自己固有的追求。从他们由“京”的浸淫而流露出有点儿类似贵族的作派，指他们的部分并无大错，用以概括全体，倒是有些勉强的。在我们看来，某种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力求获取相应的补偿的执拗，才是他们多数人的真实心态。

京派的文学群是有所挟持的，它作为文学流派固然没有重结社团，也没有发表过像样的宣言，格局松散而疏朗，然而，它赖以生存的许多条件，确凿地表现出派别的特色。

同革命文学与后来的左翼文学相比较，京派作家群在数量上显得狭小了。究竟哪些作家属于京派，目下还无定说，大体而言，歧见的出现同判断京派作家的基准不一有关。这里有几个原则是必

须注意的：首先，不能用单纯的地域概念来范围。诚然，京派作家毫无疑问主要生活在北方，特别是北平、天津和山东的几个城市，但不是凡活动在这些地方的作家都属京派，吴组缃、谢冰莹以及北平左联的作家，总不见得是京派吧。相反，如凌叔华，30年代后随其夫君陈西滢离开北平而至武汉，但她依然是京派作家。再者，也不能用单纯的政治概念来范围。京派本是一个相当松散的派别，所属作家的政治倾向也大有参差；同时京派也是一个发展的派别，用几个头面人物的政治态度去笼盖全体，大有可议之处，况且，即便这几个头面人物在思想上也是变动不居的。因此，同左翼作家、国民党御用作家相比，用“同政治有程度不同的距离”来说明，似乎比较符合实际状况。最后，京派不完全等于“京味”。张恨水的不少作品尽管京味十足，天桥、大栅栏、小胡同，如此等等，留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再给他乔装打扮，但谁都会认出他不是京派作家。而多数的京派作家，他们是因着创作了不少绝无半点京味的作品而饮誉文坛的。总之，这里需要一个综合的标尺，这个标尺首先是文学的：文学的思想和创作的风格。沈从文在他的回忆文字中有过记载

北方《诗刊》结束十余年，……北平地方又有了一群新诗人和几个好事者，产生了一个读诗会。这个集会在北平后门慈慧殿3号朱光潜先生家中按时举行，参加的人实在不少。北大有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诸先生，清华有朱自清、俞平伯、王了一、李健吾、林庚、曹葆华诸先生，此外尚有林徽因女士、周熙良先生等等。这些人或曾在读诗会上作过关于诗的谈话，或者曾把新诗、旧诗、外国诗当众诵过，读过，说过，哼过。大家兴致所集中的一件事，就是新诗的诵读上，究竟有无成功可能？……<sup>①</sup>

<sup>①</sup> 《说朗诵诗〈一点历史的回溯〉》，1938年10月1至5日香港《星岛日报·星座》。

沈从文无意在这里开列一张京派作家的名单，实际上既不全，有些也不能算是京派作家，但他确乎已泄露了一个相当清晰的消息：京派作家虽然相当宽泛，就其核心成员的背景看，多数似乎与北大、清华这两所名牌大学有因缘，其中包括一批于此前已知名的，也包括当时崭露头角的，需要补充的，还有着一些随京派文学的影响而不断被吸引进圈子里的。概括地说，他们包括以下几部分人：其一，20年代末期语丝社分化后留下的一批在小品散文上标能擅美的作家；其二，现代评论派、新月社留下的或与之关系较为密切的部分作家；其三，坚守《浅草——沉钟》阵地，继续难以忘情于文学的一些作家；其四，北大、清华等校的师生，主要分布在平津和山东。凡4个方面，以第四类为生力军、主力军，他们在创作、批评、翻译等多种部门都有相当的成绩，其中有些人以专攻一门取胜，更多的却以“通才”见长，一个人兼有几副好身手，令人叹为观止。

这批作家在学艺辈份上有差异，但多数习惯于相对固定的阵地上发表自己的创作和议论，大概这正是他们流派意识的不自觉外现。后期的《语丝》随时代因素的变迁日渐改变了它的初衷，却成了初期京派作家的摇篮。疏荡冲淡的趣味替代了暴躁凌厉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小品大师周作人的旗帜招引了徐祖正、冯文炳、梁遇春这一些稍微年轻的作家。尽管他们并不迷恋于骸骨，大都也无摩挲古董的雅兴，但大体是应《语丝》“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生活”而诉诸热情和希望的。与此同时，老牌的《现代评论》和《新月》，它们的那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上层的风仪，对艺术形式的极度敏感，尤其在政治上所谓“特乏不倚”的标榜，借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后的特殊气氛，也借着它们固有的“圈子”气质，同样发育或赓续了一批后来的京派中坚。

《语丝》的终刊不久，1930年5月，《骆驼草》周刊在北平创刊，这是一份京派作家稍带自觉意识的文学刊物。它的诞生，并不是为

了接续《语丝》的香火，却依然带着《语丝》的余绪，随笔、杂感是其明显的胜场，也开始刊载创作小说，倒为《语丝》所无。俞平伯、徐祖正、废名、冯至、程鹤西、梁遇春等是其基本班底，而周作人依然是实际上的主帅。他的自由主义文艺观浓重地笼罩着这份新起的刊物。倘若把它同当时上海滩上层出不穷的带有左翼倾向的文学期刊相对照，便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它的存在，开始对平津部分作家有着不可忽视的凝聚力。原本可以理解的自足性，在宏观上发展成为日后派别的对抗性。顺便带一句：“新月”同人1931年1月在上海创办的《诗刊》季刊，仅有四期，但它的主张以及所发表的文字，已与京派连成一气。徐志摩大去后，它仍旧支撑着，它以其诗，而《骆驼草》以其散文，一北一南，遥相呼应。

《京报》、《华北日报》、天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在《骆驼草》、《诗刊》之后，俨然成为京派作家驰驱的基本阵地。尤其是《大公报·文艺》副刊，自杨振声、沈从文接编以来，成功地辐射着对北方文学青年的亲和力。它不只滋润和擢拔了一个优秀的青年京派作家——萧乾，排解了他由生活的迫力而生成的惨淡的梦，推动他坚实地走上文学的道路，并且还通过他实现了京派几代人的接力。这份副刊是京派文学群开展期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存在得最久，历时最长，并且最富有连续性的京派文学阵地。1936年由它组织颁发文艺奖金，可称是一件盛举。这里自然包含有主编萧乾借鉴西方报业经验的灵感，但实际上则是一次名实相副的京派文学大检阅。裁判委员包括杨振声、朱自清、朱光潜、叶圣陶、巴金、靳以、李健吾、林徽因、沈从文和凌叔华，光就这份名单，已有显豁的色彩；至于获奖作品，戏剧归曹禺的《日出》，散文归何其芳的《画梦录》，小说方面，芦焚的《谷》最终换下了先前提名的左翼小说的模范——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这更是托出了这次“文艺奖金”的潜在背景。

1934年，巴金、郑振铎从上海来北平，他们同原先在北平的靳以、卞之琳等携手共进，先后创办了《文季月刊》和《水星》。这两份

杂志本是为调和南北文学作家、丰富作品产生的，很难说是京派刊物，但实在地为当时的京派作家开辟了新的天地。巴金、郑振铎不是左翼作家，他们离开上海而北上办刊物，而刊物又主重刊载京派新老作家的作品，已清楚地显示了他们两位对京派作家的高度重视。事实大致可以这样解释，是京派作家的实际影响促成了郑、巴的北上，而郑、巴主持的刊物又进一步扩大了京派文学的影响。《文学季刊》特邀 108 人为“撰稿人”，其中几乎囊括当时京派作家的全部。《水星》尤为突出，该刊专登新作，散文包含相当可观的规模，而京派作家大体垄断了这块地盘。周作人、沈从文、李健吾、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萧乾、林庚等人的名字，几乎在每期的刊物上都能见到。

除北平和北方的期刊外，从全国范围看，南京中国文艺社的《文艺月刊》也吸引过不少京派作家，凌叔华、陈梦家、方令孺、沈从文、林徽因、卞之琳、何其芳、林庚、曹葆华时有作品在这份刊物上见世。《文艺月刊》的本旨是对抗左翼文艺运动的，京派作家对其趋赴的原因十分复杂，既有对左翼文艺一贯的不满，更多的是冲着它的特殊标举——“不说或少说政治，执着于艺术探索”。此外，赵景深主编的《现代文学》、施蛰存主编的《文艺风景》、康嗣群主编《文饭小品》等非左翼刊物以其宽容的文学态度，先后为京派作家在左翼刊物占绝对优势的上海滩头露面。林语堂由《语丝》而至 30 年代在上海办《论语》、《人间世》等，算是很体面地走完了他由美刺向着闲适的路。他的这些刊物同样不是为京派文学的，但倒实在地为京派中的某些资深作家提供了可观的发表机会。

1935 年一过，《水星》、《文学季刊》相继停刊。因华北时局的吃紧，一批京派作家开始陆续离开北平。萧乾的活动范围也由平津伸延至上海，组建《大公报》上海版，不过，他仍占着上海《大公报·文艺》副刊的要津，而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等联络戴望舒于 1936 年 10 月选择上海作为基地，创办《新诗》月刊。除创作外，这

份刊物兼载译诗和诗论。其中的诗论特富色彩，不同于上海的多数诗歌杂志，它特别重视新诗艺术形式的探索，例如诗的押韵、朗诵诗的节奏，以及新诗发展的新途径等等，几乎成为集中京派理论批评家兴趣的重要课题。

抗战爆发前半年，北平文坛为外界形势的险恶而多少萧条起来，京派作家也开始出现不少变化。为维系京派在文学界的地位并有效地抵御分化的演进，1937年5月在北平出现了一份自京派存在以来最为自觉的刊物，它就是《文学杂志》月刊。主编朱光潜后来说过它的缘起：

胡适和杨振声等人想使“京派”再振作一下，就组织了一个8人编委会，筹办一种《文学杂志》。编委会之中有杨振声、沈从文、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林徽因等人和我。他们看出我是初出茅庐，不大为人所注目或容易成为靶子，就推我当主编。由胡适和王云五接洽，把新生生的《文学杂志》交商务印书馆出版。<sup>①</sup>

《文学杂志》一开张，一如既往地标榜“自由生发，自由讨论”的原则，不过它毕竟缺乏前几年那股凌空超拔的气势。《发刊词》主张“多探险，多尝试，不希望某一种特殊趣味或风格成为‘正统’”。朱光潜后来在《自传》中表白，这是他的“文艺独立自由的老调，也可以说是站在弱者的地位要求齐放争鸣的权利”。这已清楚地道破了《文学杂志》时期的京派文学群已临对并不乐观的气运。即便他们在挣扎，并且在选稿方针上也尽量放大圈子，但在不自由的中国，文学的独立自由大抵是痴人说梦。最尖锐的事实还在：《文学杂志》出至1卷4期，旋即被日寇大举侵华的铁蹄扼杀了。紧接着那批身居北平的京派作家再也无法顾影自怜，再也无法继续保持那份雅洁从容的风度，由此倒也玉成了他们中间不少人新的选择，展

<sup>①</sup> 《自传》，《艺文杂谈》。

开了生命史的新篇章。一般地说,《文学杂志》在抗战前夕的出现,表现了京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争生存权利,重图布阵的努力,而它在抗战胜利后的重新复刊,居然又历时3年,出了18期,成为这个流派的印刷物中支持得最顽强的一种,这朗然地反映了京派作家坚持自身文学信念的执拗性以及并不缺乏的自信力量。后期《文学杂志》的基干已发生较大变动,30年代的一大批健将因社会思想的转变已无热情光顾它,但也增加了一些新起的青年作家,如小说家汪曾祺、诗论家袁可嘉等,这大概只能从京派文学的实际影响的角度去理解。

京派作家群作为流派的特征同时还表现在,这个圈子的内部同新文学史上的其他有影响的派别一样,鲜明的散发着某种“嘤嘤其鸣”的亲氛围,还生动地体现了我国新文学史上互相切磋、互相提携的优良传统。特别显明的事实还表明,在他们中间前有领袖后有核心。

胡适、周作人、叶圣陶、朱自清、俞平伯、郑振铎、杨振声等,大概是京派作家最为尊敬的前辈了;鲁迅虽同他们中间的不少人很有些龃龉,甚至有的还竟直以笔战相联系,但是对鲁迅之于新文学的第一等的贡献以及他的作品所表现出的为他人难以企及的艺术水准,他们的看法是平实的,恐怕连创造社中的不少头面人物也难能望其项背。任何夸大鲁迅同京派作家之间的不和,不仅不确,并且与心理上的变态有关。京派作家的实际发展多有和前辈作家相左的个例,但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仰承了前辈作家的恩泽而成长起来的。鲁迅的那份肩负时代重闸放年轻的生命通向光明去的人杰气概,是京派作家幸运的原因之一。不过,话得再深些说,如果一般“五四”作家多以其业已形成的社会声望,他们的人品学识,他们驾驭文学的艺术等等影响着京派作家群,那么,胡适、周作人两位则以更其深刻的力量调拨着京派作家群的心灵竖琴。

文坛掌故家对胡适关照青年京派文人的行事摩挲再三的兴趣



一直没有减却过，比如他是如何送沈从文这个“乡下人”第一遭登上大学讲坛的，又如何为负笈西欧学成回国的朱光潜取得北京大学教席的……至于周作人奖掖提携后学的史例更是不胜枚举。他喜好同青年人合作办刊物，在他的大量序跋文字中有相当的篇幅是为青年人的，其中显然有不少部分是同京派的青年作家相联系的。凡此种种，诚然说明胡周他们与京派中人的契和，由此也可把捉到他们两人在情感上对于京派中人的优越地位。这些事实对纽结沟通文学派别以及其中的作家显然有着特殊的意义，但更为重要也更为基本的则是胡适的自由主义政治立场和周作人清涩隽永的文体风格，这两层恐怕是团结和吸引当时京派作家最有感召力的旗帜。

胡适作为官方或半官方学者的命运虽早有根由，但还是30年代才开的头。此前，他倒是与官还有某种距离的。《新月》时期的胡适，也即他和京派作家交往最密并最直接发生影响的这个时期，还恪守着他先前的自由主义政治立场。当时，他刚刚接受过美国和苏联两个截然不同的经验世界的洗礼，而又面临国共两党日益尖锐残酷的政治冲突，他所显示的批判智慧是属于左右两个方面的。直至《新月》2卷4期上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与同一刊物2卷10期上的《我们走那条路》，两相一对照，大体可以找到他的思想脉律：既讨厌共产党，不满马克思主义，又对国民党的党治文化、钳制思想言论自由的所作所为，保持相当的认识。稍早于这两篇文章，同样在《新月》上发表的《人权与约法》，大概可以看作胡适这样“非革命的民主派”、“民治主义者”的精确自画像。尽管胡适的这种立场在现代中国注定不会有任何作为，但却有着十分深广的影响，尤其而且主要在上层知识分子中不乏同情者和共识者。而京派作家中的大多数，虽无胡适的地位，然而对胡适的这种政治思想表示出程度不等的赞赏，说胡适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并不夸张。京派作家群的不少头面人物在私谊上和国共两党都有关系，但是他们对国